

郝润华 著

六朝史籍与史学

黄永年著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ZHONGHUA WENSHI XINKAN

中华书局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采用考论结合、文史结合、比较分析及统计学的方法，全面论述了六朝史籍与史学的发展成就以及突出表现，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六朝史学做了系统探讨。尤其对六朝时期的史学编撰方法、史学理论及六朝史学与文学、玄学的关系，详细分析，钩沉索隐，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当有补于中国史学史、六朝文化史的教学研究工作。

中华文史新刊

六朝史籍与史学

郝润华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史籍与史学/郝润华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 - 101 - 04484 - 0

I . 六… II . 郝… III . 史学史—中国—六朝时代
IV . K092. 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999 号

书 名 六朝史籍与史学

丛书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郝润华

责任编辑 陈 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25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484 - 0/K · 1920

定 价 20.00 元

序

卞孝萱

六朝者，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封建王朝之合称。由于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南北政权对峙等原因，使南北两地区历史发展轨迹的差异明显，形成了南北方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不同特色。郝润华君好学敏求，以西北之英才，负笈于六朝古都南京者四五载，流连于南方山川之秀丽，留意于六朝文化之昌隆，认为必须总结六朝的文化建树，才能了解古代中国三至六世纪的整个文化风貌。鉴于学者们对六朝的文学艺术，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著述，而对这一时期史籍与史学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有志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经过几年努力，撰成《六朝史籍与史学》一书，不远万里，邮请审定。摩挲手稿，老眼增明，不顾严寒，呵冻撰序。

此书前三章重点在六朝史籍的考述，包括史籍的产生、发展、类别、内容、流传、散佚及作者情况等。后三章重点在六朝史学的总体论述，包括六朝史学发展与兴盛的动因，六朝的文化背景，六朝史学发达的表现，史书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六朝时期的史学思想，六朝史学与文学、玄学的关系，六朝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等等。著者采用考论结合、文史结合、比较分析以及统计学的方法，全面论述了六朝史籍与史学的发展成就以及突出表现，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六朝史学做了系统的探

讨。尤其对六朝时期的史书编撰方法、史学理论以及六朝史学与文学、玄学的关系,详细分析,提出新的见解。

著者在“引论”中,概述了六朝史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之后,提出“正是六朝时期这种儒玄相互激荡的文化氛围,才造就了一批富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学家,他们既固守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继承《春秋》褒贬笔法,发扬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前輩所开创的优良传统,又吸取玄学高瞻远瞩、追根穷源的理论思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六朝史学的发展增光添彩。于是,在六朝史籍与史学的成就中,便既有玄学思潮带来的深邃思考,又有儒家文化传统厚重足迹”的卓见。

史籍方面:六朝史籍,丰富多样。著者对现存者、散佚者都进行了梳理。对于六朝史部之独立,撰修通史之风气,重视当代史之编纂,谱牒之大量产生,史注之发达,私家修史之兴盛等,透过现象,探求原因。著者关注六朝编年体史书,认为在结构安排、叙事方法、史论的形式到内容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一)具备一定的创作义例;(二)能够发扬《春秋》褒贬笔法与《史记》的实录精神;(三)多有自注;(四)注重史论;(五)在史书中录入大量文献资料;(六)广泛运用追叙法。这是对编年体的继承与发展,使编年体成为可以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史体。

史学方面:六朝史学思想蓬勃发展。著者注意到史家对史学目的与功用之新认识。出于六朝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六朝史家大力提倡史学的借鉴作用,并在史书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又由于六朝时期民族矛盾激烈,在史学思想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正统观(正统论),包括诸史对三国的正统见解、南北朝的索虏与岛夷之争、六朝的帝位正统等方面。还由于在长期分裂的局面下,人们渴望统一,六朝史家十分重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裴松之、袁宏、范晔、沈约、萧子显等人在其史著中都有这方

面的体现，他们试图在撰写史书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供统治者借鉴，以便建立起大一统的社会。至于六朝史学与文学、玄学的渗透问题，著者尤感兴趣，提出：六朝史学既有其独立性，又受到六朝文学风气的影响，在叙事、载言、体例、内容等方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从学者的史、玄双重身分，史书中史论的大量出现，史家品评人物的标准，史书体例等方面，论述六朝史学所受玄风之熏染。

在“结语”中，著者对六朝史籍与史学的发展情况做了总体评价，并指出它对后代史学的影响以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总之，此书体大思精，钩沉索隐，人无我有，人有我全，出版后对中国史学史、六朝文化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均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〇〇五年元月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六朝史籍概述	26
一 丰富多样的六朝史籍	27
二 六朝史籍的流传与散佚	52
第二章 六朝史籍的编撰	69
一 现存正史——《后汉书》、《宋书》及《南齐书》	69
二 《后汉纪》及诸家后汉书的编纂	86
三 诸家晋书的编撰与存佚	100
四 《三国志》裴松之注的价值	117
第三章 史书部类的独立与史家的事业	141
一 受帝王推崇的史官文化	141
二 私家修史与史家社会地位的提高	153
三 《七录》与史部书的独立	160
四 对史书编撰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166
第四章 史书编纂体裁的新探索	178
一 编年体史书的新探索	178
二 重视当代史的编撰	192
三 谱牒的大量产生及其原因	197
四 通史体史著的撰修	207
第五章 史学思想的发展	217
一 对史学目的与功用的新认识	218

二	史学正闰论	223
三	史家著史态度——直书与曲笔	240
四	人物评论的标准与方法	246
五	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	255
第六章	六朝史学与文学、玄学的关系	266
一	六朝史学的特质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266
二	玄学影响下的六朝史学	281
结语	六朝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	297
主要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09

引 论

作为一部具有断代史学史性质的研究选题，理应以魏晋南北朝为断代依据，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时期，以往的史学史著作也都是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时期来考察的。然而，这一时期，由于长达将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使南北两地历史发展轨迹的差异十分明显，从而也形成了南北方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不同特色。

关于六朝，有两种不同说法：就王朝而言，是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即《宋史·张守传》所谓“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若以时代论，则指起自三国，终至陈朝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在中国南北各地建立的大大小小政权，如魏、吴、汉（蜀）、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魏（北魏，后分为东、西魏）、齐（北齐）、周（北周），一般又简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若以魏代表三国，则又简称为“魏晋南北朝”，或者干脆以在南方建都的六个王朝为时代代表，再简称为“六朝”。所以，后世学者称六朝多以时代论，而不以王朝论。如清人许梿的《六朝文絜》，不仅有南方六朝作家的文章，也有西晋、北魏、北齐、北周等北朝作家的文章。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六朝部分，不仅有《全宋文》、《全齐文》等，还有《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及《全隋文》。一般的文学史中称为“汉魏六朝”，当是以此种说法为准。本书所称六朝，即持前一种说法。从时代上讲，则起自三国吴，止于南朝陈亡，指的是三国中的吴

(222—280)、两晋中的东晋(317—420)，南北朝中的南朝——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六个王朝。东吴较曹魏建国晚两年，陈被灭国时隋已建国八年，即从222年至581年。从时间上说，它是长达近四个世纪的一段历史时期；从地域来讲，这六个王朝相继建都在建康（亦称建业，即今江苏南京），统治区域基本局限于江南一隅，因此，将之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来看。它集中反映了中古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的发展情况，而南方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征。

中国直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始终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达程度遥遥领先于周边地区，江南则是所谓蛮夷荒僻之域。但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时间内，江南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沈约在《宋书·沈昱庆传》后史臣曰：“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鄖、杜之间，不能比也。”鄖杜之间即指关中，在南朝宋时江南经济的发展就赶上了北方号称“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区。江南地区的这种快速发展，无疑得益于六朝时期的开发。随着经济的逐步开发与繁荣，六朝的文化、学术也显示出与北方不同的特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总体上是分裂割据，混战不已。但南北两地比较，南方的社会环境远比北方要安定得多，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时期的南方六朝不仅在政治上显示出它相对独立的时断和空间，而且在文化方面尤其具有个性特点和突出的表现，这一点，老一辈学者早有论述，如陈寅恪先生在其《南北社会的差异与学术的沟通》

讲演稿中指出：“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进。”又引《隋书·儒林传序》“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为例，指出：“南尚新学，北尚旧学。”“南北相较，南学胜于北学”^①。唐长孺先生也在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详细考证了江南文化学术玄学化的表现，其在第四章“南北学风的差异”中指出：“南朝思想学术上的儒玄兼综、儒玄通达，导致重义解的经学，并产生玄学化的经注。……南朝佛教之重义解不仅出于玄学，而且继续受到玄学的影响，并最终在更高的基础上玄学化。”^②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学”就是这种玄学化的学术。在此姑且不去追究南学是否一定胜于北学，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至少表明了一点，即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的学术文化与北方是有差异的，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正因为六朝的学术文化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六朝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来看待，以便更集中地研究其政治经济情况与文化发展。本书即将六朝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希望用个案分析和宏观考察的方法摄取其中有个性色彩的史学画面奉献给读者。

我国学者从事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如果以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的出版为起点的话，至今已经有约八十年的历史。这期间产生了像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邹贤俊《中国古代史学史纲》、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及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等一批高质量的史学史著作，这些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

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南整理，黄山书社 1987 年版。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 224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发展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如金毓黼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私家修史兴盛的一个时期^①。白寿彝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的发展时期，他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史学的三个表现：史书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发展，反映了门阀地主的要求与趣味，体现了时代特色^②。瞿林东先生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史学的多途发展时期。“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促使史学在‘成一家之言’和创立‘正史’之后走向多途发展的趋势：在‘正史’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史书的种类和数量剧增，门阀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至为突出”^③等等。以上这些论点都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总结，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六朝史学作为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一个重要时段，它既有着魏晋南北朝史学的一些共性，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本书写作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六朝时期的史籍情况与史学发展脉络的把握与研究，探讨我国六朝史学的总体特征，从而揭示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的地位。

一

六朝时期在思想文化上的最大特点便是玄学思潮的峰起，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佛、道二教都受到它的薰染。既然六朝的学术文化深深地打上了玄学的烙印，那么，要研究这一时代的史籍与史学发展状况，就不能不了解以玄学为标志的时代思潮以及与这一思潮若即若离的儒家文化传统。

①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自序”，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所谓“正始之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主张“以无为本”；二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三是以向秀、郭向为代表，主张“名教即自然”。玄学思潮的形成，简单地说，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清议之风。两汉取士选官，察举是主要途径。所谓察举又称乡举里选，即由士人所在地的绅士、名流评品推举，由此而兴起乡党品评人物的清议。汉代以儒家孝道治天下，逐渐形成全社会重视道德精神的风气，故察举与评品率以人物道德精神与气质品格为准的，从而也就形成了庞大的清流名士阶层，如东汉末形成的所谓“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李膺、荀爽、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八顾”（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八及”（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等称号的名士，就多以清名高标、德行廉直著称。范晔说：

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①

同时，东汉以来的人物评品和清议已不仅仅专注于外在的道德伦理言行，而越来越重视人的精神气质的高迈清远，如郭林宗评论黄宪的精神感染力是：“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

① 《后汉书·党锢列传》。

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李膺评论荀淑、钟皓说：“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①范滂评论郭林宗说：“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②崇尚玄远的结果必然是老庄思想的盛行。

造成玄学思潮的另一动因则是东汉末到魏晋之际，社会政治势力对清流名士的沉重打击。东汉末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③。评品人物渐变成评论执政高官，横议当朝得失，以扫除天下腐朽之风为己任。这便引起了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党锢之祸因而产生，名士遭到沉重打击，如刘淑、李膺、杜密辈多被杀或自裁。但经汉末变乱，经曹操等士流的努力，清流之士终得取胜，清议之风延及三国。三国纷争，更加迫使统治者重视人才，故三国惟才是举之风盛行，人物评品依然如汉代一样受到尊崇。至魏晋替代之际，曹操在重视士人的同时也借机铲除那些不为曹氏所用的名士，如祢衡、孔融、杨修等。特别是司马氏行将代曹之际，更是大肆诛杀清流，许多名士惨遭杀害，连何晏这样的名士领袖人物也不能幸免。故名士们自东汉末便在心中涌起一股厌恶现实、崇尚虚远而寻求精神解脱的思潮，如《后汉书·刘祐传》引延笃致刘祐书说：“吾子怀蘧氏之可卷，体宁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为事，何其劭与！”蘧氏即蘧伯玉，孔子所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君子”，宁子则孔子所谓“邦无道则愚”者。老庄思想遂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和归宿。

① 《世说新语·德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② 《后汉书·范滂传》。

③ 《后汉书·党锢列传》。

同时，由于门阀氏族制的确立，使皇权专制政治受到很大削弱，社会自由风气日渐兴盛，人本个性得到相当解放，追求精神洞达、个性解放的庄学遂得以大行其道，从此老、庄真正合而为一而形成玄学。

当然，玄学的产生还有其他社会原因与文化思想渊源，即汉末与魏晋社会的大动荡、大裂变，被汉代正统儒学长期禁锢的思想与思潮一旦因政治变革而得到释放，便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加上当时易学及天道之学异常活跃，其结果就形成了体现思想自由、追求玄远思辨的玄学思潮。

由清谈而玄谈，由玄谈而玄学，由玄学而玄风，这是六朝时期玄学思潮的发展轨迹。清谈是东汉末的风气，玄谈是魏晋时尚，玄学是玄谈的理论结晶，玄风是玄学对社会的薰染。《世说新语·文学》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又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可见，魏晋玄谈均以老庄所论“有无”、“道德”等虚玄的哲学命题为内容。当然玄谈必须有玄学理论研究作后盾，故魏晋玄谈家往往都是深研老庄哲学的学者，他们发挥老庄义理，进而又用老庄思想解释《周易》，如当时玄学名士何晏、王弼都曾分别注《老子》、《庄子》、《周易》等，他们以“无”释“道”，提出“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贵无思想，认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本质便是“无”，“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

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①。其论一出，响应者风从。自此，玄风颺起，日盛一日。继起者又有阮籍、嵇康、向秀等“竹林七贤”，他们没有讨论有无问题，而是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②，认为“自然”是本，名教为末。史载，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③。

玄谈、玄学发展到后来，便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玄风的特点，一是讲究仪表与精神的统一，人们竞相追慕神清气爽、从容不迫、衣冠楚楚、悠哉游哉的形象。如《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这实际上是自东汉末以来人物清议与评品所造成的一种社会氛围，即全社会都重视人的精神与才性陶冶及表现。正因如此，才有刘劭《人物志》这样专门探讨人才成长与识别的专著的出现。而刘劭《人物志》的立论宗旨正是道家与儒家均十分重视的“穷理尽性”问题，他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物生有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凡人之质量，中

①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40章，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本，台湾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

② 《嵇康集》卷六《释私论》。

③ 《晋书·向秀传》。

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玄谈的重要话题“才性”之辩也由此而来。二是崇尚玄远清谈与名理争辩。如上所述，王弼与何晏、傅嘏与荀粲等人的论辩即可为证。又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燠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可想而知，当时的争论场面是相当热烈的。三是整个社会中上层莫不以参与清谈为荣、莫不以论辩名理为妙。如《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邓粲《晋纪》载：“（裴）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裴遐清谈之声妙如琴瑟，乃至“知与不知”者无不叹服其高妙。又如《世说新语·夙惠》：“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清谈之言甚至感染到儿童，使之能够句句入耳而复演述之。干宝《晋纪·总论》在谈到六朝玄风薰炽状况时说：

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子